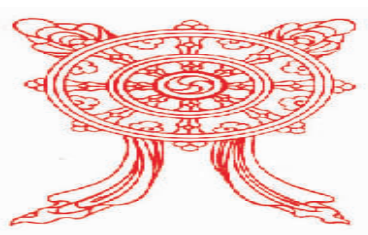


朗达玛时期为何又称为“灭法时期”？

朗达玛，其全名为赤达玛乌冬赞普(别名朗达玛，《唐书》译作达磨)，为赤德松赞第二子。公元838年，继热巴坚为吐蕃王。据藏文史籍记载，朗达玛是一个“嗜酒喜内，凶悖少恩”的人。因为他反对佛教，佛教徒说他是牛魔王下界，因此在他的名字前加了一个“牛”字，就成了朗达玛(朗：在藏语中为“牛”之意)，以示对他的反感。由于赤祖德赞(赤热巴坚本名)大兴佛教，并在王朝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很多时候由僧人左右着朝政，因而招致支持本教的才崩氏(赤松德赞的正妃)“我怕佛教兴盛后，赞普的王位将因此而丧失”的王室中以朗达玛为首的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和极大愤慨。他们设计发动了一场以灭佛为目的的政变，并乘赤祖德赞喝醉酒时将其绞死。朗达马于公元838年继赞普之位。

朗达玛(公元838—842年在位)于公元838年登上赞普宝座后(汉史称他为达磨赞普)，他首先停建、封闭佛教寺院和破坏寺庙设施，把赤祖德赞时期已经开工修建的佛寺都停了工，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神殿都被关闭查封，小昭寺被当作牛圈使用，凡是佛教活动的场所都遭到查禁。许多佛像从寺庙里搬了出来，钉上钉子扔到河里，大昭寺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据说也打算扔到河里去，但因神力所致而不易移动被再一次埋了起来。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将寺内壁画抹掉，在上面画上僧人饮酒作乐的画，借此来达到衰废佛教的目地。接着焚毁佛经，有数量众多的各种佛经被烧毁，其中有少数佛经被僧人偷偷地埋入岩洞之中才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些佛经被僧人带着逃到边远的地方去了。佛教僧人同时遭到镇压，僧人在吐蕃的处境异常艰难，他们大多逃离吐蕃统治区，印度来的僧人逃走了，有一部分吐蕃的佛教徒也跟着逃到印度。留在吐蕃的僧人被迫还俗或者弃佛归本，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就得带上猎狗，拿着弓箭去打猎……等等，而这些都是佛教僧人绝对禁止做的事情。

朗达玛摧毁佛教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对佛教的打击十分沉重，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以致西藏佛教史把朗达玛时代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时期”(佛教全面走向衰亡时期)。公元842年，朗达玛为僧人拉隆巴机多吉所杀。随着达磨赞普的死去，从九天降到雪域的神圣赞普终于退出了西藏的历史舞台。吐蕃王朝统一之局面从此宣告结束。从七世纪开始，数辈赞普的不懈努力才为吐蕃迎来了佛教文化的曙光，而一代赞普的叛逆却把他们的事业毁得干干净净，直到几个世纪以后，佛教的曙光才重新普照雪域。



历史上西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与侵略者作过哪些艰苦的斗争？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地处西南边陲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西藏也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这些帝国主义列强中，英国和俄国对我国西藏垂涎三尺，早就怀有侵吞的野心，它们采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对英、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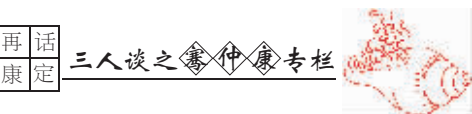
(一)公元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在继续征服邻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诸国的同时，采用要挟清朝政府划定中国西部边界，以及允许外国人到西藏游历、通商等手段，妄图打开入侵西藏的大门。因西藏人民誓死反对，而没有得逞。

(二)在用游历、通商等手段打开西藏大门的企图失败后，英国于公元一八八八年采用野蛮的武装入侵的方式，进攻西藏，遭到西藏人民的顽强抵抗。

(三)公元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在帕里、骨鲁(又称夏乌)、江孜等地与英国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着祖国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座房屋，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数千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也纷纷倒在了侵略者血腥的屠刀下。江孜保卫战是西藏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的一次主要战役，是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史上光辉的一页。西藏人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也曾鼓舞着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从丹巴县城逆小金川河而行，车行26公里便来到寺院的所在地——丹巴县半扇门乡喇嘛寺村，曲登沙寺是丹巴县乃至整个藏区有名的寺院之一，下临小金川河，背靠四达乌山。原来在小金川河上有一条铁索桥将两岸紧紧相连，当时桥面全由当地居民自己捐赠木板铺垫而成，木板风吹日晒化为腐朽，人踩在上面咔味作响，有些木板不堪重物的压力断落到河里，瞬间被漩涡卷到了水底。而今天壑变通途，一座水泥浇筑的石拱桥横跨两岸。

很久以前我就有到曲登沙寺一游之心，去亲身感受一下其雄伟伟岸，然而因琐事的羁绊，只好一次次作罢，遂对此渐渐淡忘。曾几何时，重拾起闲云野鹤的心，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里，终于梦想成真，与民院研究藏学的凌教授一起来到寺院所在地。从远处观望，曲登沙寺修建在一突起的山崖上，下临奔腾不息的小金川河，寺院两侧山势逐渐趋缓，目之所及是小金谷中高低起伏肥沃的土地，寺院背后是巍峨耸立的四达乌山，整座山形如同一只矫健的雄鹰展开羽翅腾空欲飞。相传一位在布达拉宫学习佛法的高僧将布达拉宫刻在萝卜之上，学成归来之后将其带回嘉绒藏地，回到小金谷后因萝卜脱水干瘪了不少，所以该寺修建完毕后与布达拉宫相比外形酷似但比列却缩小了很多。从公路出发，跨过小金川河，沿着蜿蜒崎岖的盘山小路缓步而行，道路全由大小不一的石板铺垫而成，路宽约两米左右，两侧是居民的房屋，路旁还残存着古建筑遗留的石砌断壁残垣，仿佛在那无声的诉说着历史变迁所带来的累累伤痕。走到正殿下，左右都有两条宽约3米的石阶直通正门，你可以根据自己所信仰的教派而自行选择路线(黄教黑教之分)。沿着石阶缓步而上，来到寺院的大门口，曲登沙寺的大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两根



三人谈之康仲康专栏

同知府上

打箭炉行政厅一经设立，初隶雅州府，驻同知。同知府祇设于达朵与折朵间关隘上。以蛮人筑碉法建起，后被贡曲涨水冲毁，改设在今天的康定宾馆下方靠山处，木楼架起小小一四合院落，前有将军辕，后有土司衙。同知府应该是衙门，却让军辕取代了身份。同知行台，更是专为钦差督办大臣所设，不是衙门是持贡。土司家，却叫明正衙门，这就成了一桩蹊跷事。到后来，打箭炉属直隶厅，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又径隶建昌道，道台分署也在原同知府那地儿上，仍袭称同知府。

建厅之初，同知大人彰显朝廷威严于西炉边陲，作为流官，向无先例。察情理事，乏典可循。启用未获当朝认定身份的土职明正世家，实属良策。朝官少不得土豪鼎力相助，乌拉差役柴草粮秣，尽有所依靠地方。客观上形成“土流兼治”格局，料理边务事半功倍。历任同知，也还绷得起父母官的面子。

驻炉同知府，施行皇纲，是以支配明正为能事的，对前朝土职后裔，已经不再是通常的羁縻概念，更像是施威，而加威又不露声色。而须体恤怀柔处，又慷慨加恩，有功必赏。同知高兴的事，多半皇帝也满意。别地里以夷治夷，在这儿竟然呈现着“无为而治，实乃大治”境况。如此安康宁边，合乎天理人情世道。

这同知大人开堂，身边红、黑两师爷，各执朱批墨批两支笔，呈差官司应了尽了。那些“等因奉此”一应文书，由黑笔师爷办了就好。命案财讼要紧事，土司斗胆不敢决断的，交红笔师爷，公堂执法，正大光明。地方上民务民生事宜，自有土司承担，同知也操不了这份心。常年粮赋只是象征，收徵茶税纳取金课相对是重头，以及挖药狩山所本执据，禁烟规娼执行策术，却是要同知亲自过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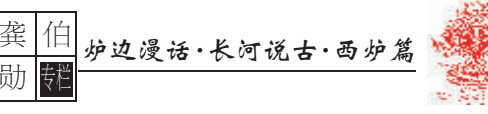
同知府上十余随从，平底靴脚印盖满白土坎秀土包以下。平常不着顶戴，不轿不骑，身为官家像是百姓样的。同知大人又不驻炉过冬，让人觉得同知府上有吏无官。只要府上灯笼彻夜亮起，

原木矗立在两旁，上面有能工巧匠雕刻的飞天图案，飘逸的衣带，环绕的云雾衬托出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进入木门，映入眼帘的是数百平方米用石板铺垫的坝子和雄伟的大殿，门两侧是供僧人居住的禅房，有几个僧人坐在门前翻看着佛经，或高声诵读，或只见其嘴唇微动而不闻其声；据寺管会主任介绍，现该寺有僧人20人，平时都在各自的村庄中为人们念经祈福，每年这里举办大型佛事活动时才又聚在一起。

大殿前的空地上零零星星的几位香客静默地忙着烧香许愿。曲登沙寺给人的感觉就是庄重和空旷。在坝子的边上有一高约两米的石碑，正面用阳文雕刻着建寺时土著居民布施功德的记载，有的是几石粮食，有的是碎银几两，不一而足，其背面的文字已被铲除，经寺里僧人介绍，原来这上面用藏汉文雕刻着建寺的历史，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被铲除，刻上了红星。走过大坝，又需拾阶而上，大殿正门两旁的墙壁上画着四大天王的佛像，那狰狞的面孔让人不寒而栗。大殿的正门也是由原木加工而成，雕刻着一串串几可乱真的佛珠。门上挂着厚厚的布帘，掀开布帘，正殿内飘出淡淡的酥油清香味，那是千年灯日夜不停的燃烧着酥油而带来的香味，殿里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慈祥的面孔，垂肩的双耳，端庄的举止，让人情不自禁双手合十，匍匐在地。释迦牟尼佛像两侧供奉着许多嘉绒民间的佛神。寺庙内还保存着600年前绘制的壁画，相传每画一笔都要念诵经文很多遍，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22年才会绘制成功，因此这幅壁画弥足珍贵，文革期间墙的四壁被涂上厚厚的黄泥，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洗去黄泥重见天日，然而已有不少被损坏。为了使壁画恢复原貌，也聘请过藏区一些知名的唐卡绘画大师前来修复，当他们站在壁画前时，

竟然觉得无从下笔，为壁画的精湛技艺深深的折服，只好作罢。

曲登沙寺始建于公元1415年，是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察柯堪钦、昂旺扎巴受大师派遣，在嘉绒地区修建108座白塔(上图就是在原址重修的白塔)，该寺便是为维护白塔而修建的寺庙之一，属藏区第107个寺庙，取名为“曲登沙寺”，意为“白塔寺”，因地处半扇门乡喇嘛寺村，也称小金喇嘛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属苯波教寺庙，时有喇嘛400余人。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丹巴及金川境内的土司之间争权夺利，大金川土司沙罗奔起兵攻掠草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边境地，清政府任命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而被沙罗奔利用天时地利所败，后纪山改用以碉围碉的战术才迫使沙罗奔投降，清政府仍让其担任土司一职。莎罗奔病死之后，其孙索诺木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诱杀革布什札土司官，公开与清政府为敌，朝廷派出大批军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平定索诺木之乱，战后，清廷决定改土归流，废除小金川土司制度，设厅委派官员，又置重兵镇守，加强对该地区的管辖。在当时神权统治时期，大金川著名的苯波教僧忠拉顶寺为了自己的利益，全力维护小金川及整个嘉绒藏族地区，金川土司兵员匮乏时雍忠拉顶寺及苯波教各寺庙各派出大量身强力壮的僧兵参加抵抗清军的战斗，而且还召集嘉绒藏区所有的苯波教寺庙喇嘛用恶毒的咒语诅咒清政府。当清军平定叛乱之后，对小金川境内的所有苯波教寺庙进行了彻底的毁灭，曲登沙寺也未能幸免，如果在敌军专注攻城，意欲开我边军的时候，出奇不意，杀将过去，敌军惊我大军从天外飞来，必然锐气大减。此刻不怕我军兵少，足可以当百。只要拿下昌都、巴塘，锐气大减的敌军再多也不怕了。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就马上发兵了。



炉边漫话·长河说古·西炉篇

尹昌衡西征



尹昌衡与夫人颜机在康定

尹昌衡不顾病体，决定亲率川军西征，完全是从大局出发。

经再三电请，民国元年(1912年)6月14日，中央终电令尹率师亲征。他赓即率兵三营，星驰而西。

行前尹昌衡特别发表《西征别川人书》，开头就说：“大汉国本未固，而边藏离逸，是使我光复之土不全，而神明之胄不武也。用特修我六师以镇藩服，而雪国耻，此即荷锄忠尽瘁之秋也。然而犹有忧者，则不在冰山雪岭阻前途，而在于河内关中无后继。是以车马既西，尤不能不眷眷东顾也。”洋洋千言，情真意切，表达了西征的决心，也道出了他的东顾之忧。

6月17日，西征军先遣一大队朱森林前锋团出发时，数万群众高唱出征曲欢呼相送，夹道十里，壺浆填道，壮行场面十分感人。

西征之途，并非一帆风顺。朱森林部到了炉关，就疑其军孤而不进，尹昌衡赶到雅州，极力催促也不向前。而炉边宣慰使黄熙昌又接连飞报：“全边且旦暮尽失，益请出兵。”面对炉边朝夕不保的严峻形势，

千古绝唱阿干歌(一)

■ 伊秀丽

飘，气吞山河，所向披靡。然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民族只是一闪而过，如同流星划过夜空。在那遥远的年代，鲜卑人就像夜空中的飞蛾，一次次扑向中原，投向光明，又一次次被汉民族和汉文化所消融、所吸纳。一千多年来，历史的演绎中早已经不见了鲜卑人的踪影，他们似乎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谜团，一个传说，又似乎总是飘忽在我们的眼前。

在青海，我偶然发现了慕容鲜卑人留下的踪迹。那是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开始的。

发源于辽河流域的慕容鲜卑，距今今天已经十分遥远了，遥远到只有文学作品中还能闪现出一点点模糊的影子。翻阅古史典籍，有关慕容鲜卑的记载，也是寥寥数笔，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捧水，一叶舟。可是在一千七百多年前，慕容家族的铁蹄曾踏遍黄淮以北的广大地区，与东晋、前秦成三足鼎立之势。立国已经七百多年的夫余国，是当时东北松嫩平原上最大最强最富足的国家，可是在慕容鲜卑人一次次摧枯拉朽般的横扫涤荡下，耗尽了最后一丝精气。那时候的慕容鲜卑，马嘶旌



学者论坛



谭凯摄影作品选

五色海

第 621 期